

红军长征在滩歌

记红四方面军九十一师部分部队住滩歌情况

于申明

邢效贤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后，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九十一师，在武山的鸳鸯镇、颜家门、山丹镇、渭河铺等地驻40多天，并在这些地方发动群众，建立了地方苏维埃、农会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九十一师的一部分人，约一个团的兵力驻在滩歌镇。这支部队没有去漳县的新寺（大部分部队是经草滩至新寺，然后分散到各地）。而是从岷县的闫井分道后，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经马坞，现在为沿安。又转向龙台的山羊坪；一部分经锁龙穿过南沟，最后都会集在滩歌镇（也有一部分直接去山丹）。红军到了

滩歌地区后，全住在滩歌街道上，领导机关在郭家堡子（大地主郭翰的土围子庄院）内，连队分散住在上下街和关家庄一带。

红军在滩歌刚刚住下，国民党闻讯派两架飞机轰炸。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没有见过飞机，一听见隆隆的马达声，就到处躲藏，有的甚至钻进地窖里。只有少数胆大不怕死的人，才敢到庄间巷道里去看飞机。我们的村子（漆家庄）本来没有红军，但却给撩了两个炸弹，当时庄上头和庄下头各集中几十人，炸弹正是对这两摊子人投下的，幸亏投弹技术差，爆炸点和人羣相距三、四十米，且中间有土墙相隔，未伤及一个人，只是炸死了不少麻雀。事后得知，在同一天，又在关家庄扔炸弹两枚，下街和中街也扔了两枚，都未造成伤亡。据说大堡子内对飞机要来轰炸有准备，提前组织人把十多片竹席串在一起，用大红布制成“镇兴堡”

三个大字，搁置在地势高而又显眼的地方作为标记，好让飞机来识别。可能是堡子内的反动头目和国民党的上级军事部门有联系。

国民党派飞机进行轰炸，对红军并没有造成什么威胁，红军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但在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筹粮筹款过程中，却遭到了地方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代表——土豪劣绅的顽抗；这倒给红军带来不少麻烦，甚至使红军付出不少代价。红军住滩歌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力量是用在和地方反动势力作斗争上。

滩歌镇当时是武山南部比较大的一个镇子，又是供应周围几十个县的竹木农具山货集散地，加上关家庄，当时全镇的人口约在2千人左右。红军来到这里后，由于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对红军的任务不了解，对红军实行的各项政策不了解，加上国民党的恶意宣传和造谣

诬蔑，相当一部分人“跑贼”进了堡子，没有进堡子的也躲到其他地方去了，街道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地方上的豪绅们正是利用了群众对红军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心里，且自信有什么摧不垮、打不烂的“紫禁城”作为依托，因此，才敢和红军作对抗。

镇西依山坪修建的堡子，因其规模比其它堡子大，故曰“大堡子”，又叫“镇兴堡”。堡内虽设有堡长，但只是挂名的（当时堡长魏立臣），实权主要操在当时滩歌区区长相里贤（又是豪绅）、联堡主任薛树勋（豪绅）、红帮头子关老四（正名关瑞仁）及其相里贤的弟弟相里贞等几个人手里，他们利用威胁、利诱、恐吓等手段，挟制一般平民百姓只准进堡子，不准出堡子，谁要是不愿住在堡子内，或一时有事外出，就认为是“奸民”、是“通匪”，就有被示众、屠杀的可能。当时堡子内就有这样

的规定：凡堡内居民一律听从指挥，入堡者一律登记上报，不经堡长同意，一律不准出堡；不论堡内堡外的滩歌住户（包括客商），不得与红军来往、交谈情况，不得给红军带路，不能供给红军食物，不能替红军运送东西，违者以通匪论。他们还组织了一批流氓、恶棍，对堡子内的群众进行公开或秘密监督，严防逃跑，或有什么“越轨”行为。就这样，真正的劳苦老百姓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不知道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彻底翻身而打仗的。

堡子内有区警备班守卫，有40多支步枪，10多门土炮，有充足的子弹、手榴弹和火药（有些子弹火药和手榴弹直接由县上供给），还备有许多马刀、棍棒、矛杆子一类的土兵器。由于有较为严密的防备，有人就把这个堡子称为“紫禁城”。实际上是反动头目们自吹

自播。

红军对在滩歌镇将会发生的问题，似乎早就预料到了，并早就作了思想准备。部队一到这里住定后，就立即派人找相里家兄弟、薛树勋等所谓地方“绅士”，说明红军是北上抗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不侵犯群众利益，请他们帮助筹粮筹款，但均遭到拒绝。为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红军还把北山村的村民马负图（原了解北山村有李某作过县长，可能在地方上有声望，实际此人尚在新疆，误认马为李）请在郭家堡子，试图通过他的“名望”和亲身经受做堡子内头目的工作。马住20多天，多次写信晓以大义，也未见效。

在做上层人士工作的同时，红军曾多次派人到堡门口直接和堡子内联系，叫他们把堡门开放让红军进去，但每一次都遭到反动头目的拒绝。以后堡子内不仅不让红军贴近堡门，也不

允许在附近出现，一旦发现那里有红军，堡墙上的人就开枪射击，堡子内摆的阵势是要和红军对抗到底。

尽管堡子内的头目们采取的是仇视态度，但红军还是坚持没有打第一枪，甚至堡子内开枪，红军也没有以牙还牙的给予还击。一开始，红军就无意攻打这个堡子，尽量忍让克制，力争用和平的办法解决问题。红军曾在代家沟和漆家庄找了两名“绅士”，一名叫代癸巳，一名叫漆师（阴阳，原名不知叫什么）。这两个人都和堡子内的头目有过交往，也说得上话，让他们去堡子内利用私人关系作些解释工作或许能够起到作用。两人到了堡门口，同样没有让进堡子，只好大声地向堡墙上的人说：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不随意打人骂人；红军不侵犯群众利益；红军不……。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一枚手榴弹就扔了出来，正

好击中代癸巳的手臂，幸亏没有爆炸，不然两个人都被炸死在堡门口。两个人喊话无效，还险些丧了命，只好慌慌张张跑回来。这一段时间，红军还多次给堡子内的头目们写信，说明利害，喻以大义，解释红军的政策，均无回音，且对红军的攻击越来越厉害。

红军被逼得非采取必要的行动不可了。首先，把原住在郭家堡子内的部队调到关家庄，加强了关家庄的力量，封锁了堡门口。不让任何人出入；然后又在堡子南面的泰山庙、北面的娘娘庙、西面的文昌庙（这个地方距堡子只二、三百米）等地方，调配了适当的兵力，修筑了工事（有人还记得清楚，红军在柜子里装上土当工事）把堡子从四面围起来，实际上，红军并不是把堡子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天阴下雨，就有不少人从堡墙上缒下来到外边找水，有的还到地里挖洋芋，红军也不去干扰，让其

有出有进；有人还偷偷地从外面向堡子内吊东西，只要认定是穷苦老百姓，确系是为了生活，红军也不去拦阻，就叫他把东西弄到堡子里去。红军只是想加点压力，促使堡子内发生变化。但是，堡子内的头目们有点令利智昏，不仅不理解红军的用心，自觉地开放堡门，让群众和红军见面，反而变本加利，更加死心踏地的进行顽抗。

此后，堡子内除了区警备队外，还把一些土匪、恶棍组织起来，时不时放冷枪，专门伤害因事外出的红军。同时，又在所有的土炮里装上火药，一旦发现有人羣出现，就用强大的火力进行轰击，以图大量杀伤红军。此外，堡子内的头目们，还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羣众，设坛盟誓，搞什么“红枪会”，强迫羣众接受“神术”训练。凡经过“红枪会”训练的，都得绝对听从命令，随时出堡子和红军厮杀。头

目们曾两次组织“红枪会”员外出袭击，每次50多人。红军因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前后有10多支枪被夺去，有1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据说其中还有一名干部。“红枪会”员也死1人，伤1人。

面对着堡子内头目们的残暴行径，红军忍无可忍了，当即向文昌宫调配了一门迫击炮，只用了两发炮弹，其中一枚未爆，另一枚击中周文轩的小楼房，楼顶被击穿后，击毙了周的儿媳关天珍（地主女儿），同时还伤了地主的一个亲戚。这一来，堡子内乱了阵脚，基本群众怨声沸腾，有钱有势的人惊慌不定，在内外夹攻下，头目们不得不主动找人和红军联系，表示除低头认错外，还愿意筹粮筹款。当时有一个叫关丙子的人（通称丙大爷），家在关家庄，因家计艰难，常住娘娘庙，似僧非僧，似道非道，却以化缘过日子。堡子内的头目认为

红军爱穷人，此人家贫如洗，且早和红军有来往，便写了求和信要求他转达，并致意他为了堡子里的2000多人，在红军面前多说几句好话（事后该人受到迫害，加上其他问题，不久便离开人世）。经过关丙子来往传递信件，红军答应了堡子内的要求，停止了攻击，并允许堡子内的人外出找水。此后堡子内又派人和红军具体协商，除答应为红军筹集一定数量的实物、食品外，又提供了一笔大洋。事后得知，堡子内的头目们，利用为红军筹备粮款之机，还发了一批大财。当时是按照下户五两、中户十五两、上户二十两的标准，向村民普遍摊派大烟的。堡子内最少有500户，估计可收大烟2至3千两。同时，还每户摊派银洋5至10块，也可收集2至3千元，以后有人向外披露，向红军交的只是两笔款项的零头，绝大多数叫头目们中饱私囊了。

不久，红军撤了围，自9月初至10月初，堡子被围整整一个月时间。

红军在集中力量围困“大堡子”的时候，并没有放松其他地区的工作。滩歌镇附近的村子，每天都见有红军往来，他们走到那里，宣传到那里，他们确确实实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他们的行动真正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老百姓既听说的，又看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绝大多数人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亲身体会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根本是两回事。于是许多村寨敞开大门，不仅羣众可以自由的出出进进，红军也可以出进，跑到外面的人陆续回来了，生产、生活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安定。原来滩歌镇逢的是一、六集，即每旬逢一逢六，羣众都去街道赶集。红军围困“大堡子”后，集场由街道搬到相距二华里的漆家庄，同样是人烟辐辏、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每逢集天，

红军也来赶集，态度和蔼，公平合理。人们都情不自禁的说：“红军说的和做的一样”。

由于军民关系的日益密切，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事例各个村都有传闻。漆家庄有些年青人喜好玩枪枝，一看到红军早就围拢过来，有的想掂一掂枪的轻重，有的还想学“快枪”的打法，红军并不见怪，也不怕麻烦，当着众人的面就把枪的各个部件卸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小伙子们听，最后还教给射击要领，羣众也非常愿意帮红军的忙。当时不少磨房早就关了门，看磨的人也跑得无影无踪，为了解决红军的面粉加工问题，有的人不辞劳苦，不怕麻烦，到处寻找磨户，找不到就自己上磨房，没黑没明的帮助红军填料筛面，保卫红军人身安全，羣众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有的人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红军受到损害。有一次，20多名红军战士由山羊坪赶往滩歌镇，途经柳坪村

时，饿的实在不行了，想搞点饭吃，该村有几个“不务正业”的人，顿起恶意，阴谋夺红军的枪。有人闻风后，晓喻全村，羣起而攻之，坚决反对于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并赶走了几个歹徒。红军撤离滩歌地区后有10多名伤病员被留了下来，这些人在羣众的保护下大多数恢复了健康，有的在解放后还当了基层干部。

红军是1936年8月28日由岷县到达滩歌镇的，于同年10月上旬撤离滩歌随大军北上，前后在滩歌住了40天。

红军在滩歌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不仅当地羣众经常缅怀当年红军的情景，身临其境的老红军、老首长也往往触景生情，旧事重提。1970年5月，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视察国防工程路过滩歌时，曾指着“大堡寨”说：“这个土围子不简单，过去它为反动派服务，现在回到人民手

中，让宅为人民起坚强堡垒作用”。

郭化如传略

包永庄

郭化如，原名占荣。1910年生，武山县郭槐乡郭家庄人。自幼饱受磨难，性格刚强；青年投军，智勇双全。后因不满旧军队内部的黑暗，愤然离去。辗转求索，历尽艰辛，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右地下斗争。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陇渭支部书记、陇渭、陇右工委委员、陇右工委军事部长。1949年4年3日在漳（县），武（山）、陇（西）三县交界的桦林山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9岁。

郭化如因家贫，未能上学。16岁始，除租种土地外，还想方设法，买了一头毛驴，早出晚归，风餐露宿，往返于百里之间的武山洛门

和岷县马坞，依靠贩运土特产补贴贫困的生活。本世纪20年代末，甘肃连遭大旱，武山尤为严重，地主乘机盘剥，致使除夕之夜父亲因交不起租子被扣押，两兄饿死他乡。故此，于1929年参加了景平娃领导的农民起义，后因不满景的流寇行为回家。同年，一侄子被洛门镇镇长诬蔑为“土匪”，惨遭迫害，活活烧死。他多次伸冤无效，又险遭暗算。迫于无奈，于1933年初投奔国民党何戒僧团当兵。何戒僧，字玉明，武山县城关镇人。原任冯玉祥将军某部营长。冯下野后，何率部入陇，由岷县鲁大昌收编为团长，驻防碧口、武都等地。所到之处，除暴安民。他有正义感，曾与我地下党工作人员靖任秋取得联系，在靖的帮助下，何拥护革命。期间，他曾多次电请靖任秋去武都，商讨如何参加革命。不料事泄，鲁大昌想先法制人，但苦于力量不足，于是用重金贿赂胡宗